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 25% 左右一度上升至本世纪初的 32% 左右, 达到了一个高点。所以, 小布什在第一任期内的单边主义不是偶然的, 是以实力增长为后盾的。但是物极必反。2002 年和 2003 年美国分别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打了六七年仍不能摆脱困境。由于过度伸展力量, 美国硬实力受到严重消耗, 进入战略透支期, 其软实力受到削弱, 其作为“世界警察”的道德基础和道义威信一落千丈。再加上这次金融危机的打击, 美国不仅在经济上遭到重创, 而且由于其缺乏监管的金融体制导致了全球性经济灾难, 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各国的指责和诟病, 其软实力进一步下降。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已从本世纪初的 32% 左右逐渐回落至 2008 年的 24% 左右。金融危机已经使美国经济出现了严重衰退, 而且这种衰退还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可以预见的是, 经过本轮金融危机的冲击, 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还会继续下滑。这表明, 美国维持霸权的经济能力受到严重削弱, 随之而来的是美国操控国际局势的能力也在下降。

美国经济迟早能够复苏, 美国也有走出危机的能力, 在危机过后仍将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仍将有着超群的军事实力, 仍将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其政治、社会和文化仍然对一些国家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 这不能改变美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已呈相对下降之势的客观事实, 而且这一趋势由于近些年中、印等新兴大国经济的强势增长而变得更加清晰可辨。在本世纪初, 战略学界还在讨论美国单极世界的目标是否能够得逞的问题。几年过后, 就

连美国自己也不再认为那是一个能够可以实现的目标。美国的实力地位和对国际事务的操控能力已很难再回到 2000 年的高点。在经历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之后, 美国已不再是原来那个说一不二的美国。美国新一届奥巴马政府当选后放低身段, 开始向多边主义靠拢, 不仅仅是个人风格问题, 深层次的原因是美国已很难再一手遮天。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将 G20 伦敦峰会的意义表述为: “单极时代在 4 月 2 日结束。我们将会得到重要机会, 使我们能够开始在一个平面上讨论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问题。多极时代将会开启。20 国集团领导人会谈真正的政治意义就在于此。”我认为这并非夸张之辞。

当今世界处在一个大变化、大调整时期。金融危机不仅冲击现存国际秩序, 而且前所未有地激起了发展中国家要求变革国际秩序的愿望与决心。这对中国这样一个后起大国而言, 也蕴含着巨大的机遇。现在很多国家不仅希望倾听中国的声音, 而且期待中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 中国应当首先把自己的事办好, 在保持国内稳定和持续发展的基础上, 也应义不容辞地积极参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和协调行动, 并以此为契机, 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设与变革, 以渐进、和平、民主方式改革现有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不合理方面, 不断提升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力, 并由此逐步确立起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地位和形象。○

金融危机与当前国际秩序的演变*

朱 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2008 年的国际金融海啸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依然在延续, 稳定国际金融体系、避免金融危机进一步损害世界实体经济、实现世界经济的复苏是关于当前国际局势的突出议题。金融危机究竟对当前国际秩序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未来世界局势在经历了此

次金融危机震荡之后究竟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新变化? 国际权力结构在金融危机面前究竟会有什么样的调整? 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分析和判断国际形势的突出话题。

* 本文第二作者李淑华, 系中国公安大学讲师。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首先需要我们建立起统一的、可靠的分析标准。或者说,我们需要用某种可信的分析工具才能得出合理的结论,而不是简单地在“机遇”与“挑战”、“现状”与“趋势”、或者“相对”与“绝对”的概念窠臼里打转。首先,从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来看,无论金融危机如何剧烈以及是否带来世界经济新的大萧条,它都只是国际体系中的一种“进程因素”,而不是“结构因素”。“进程因素”的演变可以造成结构性的、体系性的变化,但它不可能单独对国际体系的结构和体系发挥重大作用。其次,金融危机是国际关系中的干预性变量,金融危机到底能带来什么样的体系或者结构性影响,是基于金融危机究竟能导致什么样的“应变量”的产生。可以通过金融危机而产生的、具有最大影响力的“应变量”是各国的政策选择。换句话说,各国如何去思考和决定相应的政策,是金融危机是否可能微调改变国际秩序与世界体系的最重要的观察点。第三,各国的政策选择是一个完全动态的过程,其背后的支配因素除了各国的战略定位、国内结构、政策偏好以及领导人特性之外,各国政策的互动过程以及经由这些互动而形成的政策结果,是考察和分析金融危机究竟在多大程度以及通过什么方式来影响秩序与体系问题的关键。因此,金融危机中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策选择,特别是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和打击之后的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的变更在多大程度上引起政策与战略调整,是分析金融危机究竟以什么方式冲击国际秩序的重要因素。

除此之外,金融危机影响下世界各主要国家国内局势的走向,是分析金融危机将以什么方式变更国际秩序的又一重要“变量”。金融危机在所有形式的经济危机中具有特殊性,这不仅因为克服金融危机的周期相对比较长,而且金融危机很容易引发产业危机和社会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综观今天世界各国,金融危机来临之后的“危机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全球金融危机造成世界经济在2009年出现自1945年之后第一次衰退几成定局。大国国内政治走向——可能影响大国政策与战略选择的“国内变量”值得我们密切关注。1929-1933年的世界大萧条最终加速二战爆发,一是因为经济与贸易的恶

性竞争导致了军事冒险主义上升,从安全理论来说就是打开了“修约派”国家采用军事扩张政策的“机会之窗”;二是由于大危机的影响,各种极端思潮急剧上升,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成为日本、德国与意大利等国的意识形态,加剧了国家机器的战争转型,煽动和激化了民族对立和仇恨,产生了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所说的“帝国的迷思”;三是因为国际制度软弱,缺乏有效的集体行动机制对战争和军事扩张采取集体制裁行动。从1929-1933年大危机的历史教训来看,如果此次金融危机有可能再度导致国家内部从体制到意识形态的对立,或者引发冲突性民族主义的膨胀,都将对国际秩序产生十分消极的影响。这是真正需要控制和避免的因素。

从中短期来看,金融危机将难以对国际权力结构和财富分配造成实质性影响。今天的时代背景已经完全不同于1929-1933年大危机时代。虽然深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全球自由主义主流价值的地位是稳定的,世界各国通过形成新的国际制度来协调政策和管理危机的意愿和行动是显著的。同时,危机不可能打开任何鼓励军事冒险主义的“机会之窗”。美国虽然深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但其实体经济并没有受到实质伤害,美国的霸权地位依然稳定,美国开始衰落的假设并不成立,国际秩序的基本面是稳定的。此次金融危机不管持续多久,对于国际秩序以及当前世界体系的作用不可能很突出。在国际权力结构稳定、大国关系发展的可预期性明显以及国际协调与合作机制有望增强的大局之下,国际不安全因素的重点已经转向了如何防止和应对国内因素诱发的冲突根源。

显然,在空前的全球金融海啸冲击下,保持世界经济与国际秩序稳定是当务之急。虽然应该呼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建立更为公正、摆脱美元绝对统治地位的超主权储备货币,但最重要的工作是保持全球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理性发展。如果全球金融危机加深世界范围内的价值与观念冲突,引发新的极端主义的政治意识与社会心理的畸形发展,全球意识形态冲突将可能死灰复燃。从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的经验教训来看,这无疑是有可能是有可能颠覆国际秩序的重要变量。当前的金融危

机所造成的各种问题不可能只停留在经济层面,金融救市和经济刺激方案必然带来新的利益分配和新的社会冲突。例如,美国从 2008年 4月开始的金融救市计划为美国银行系统注资 2500亿美元,批评意见认为政府在拿纳税人的钱挽救那些平时漠视民生、热衷于官商勾结的少数金融精英。华尔街金融公司 CEO的收入与员工平均工资的差异从 1965年的 24倍,扩大到了 2007年的 275倍。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后不久严词谴责华尔街高管高薪制度,要求受政府资金救助的金融企业实行限薪,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平复中低阶层民众的不满。世界各国应该在金融危机中去酝酿调整和发展更为合理的国际秩序,而不是简单地对现有国际秩序进行颠覆性的挑战。途径之一是加强各国发展实践的相互借鉴和吸收。目前,奥巴马政府的危机应对措施所显现的“向左转”以及中国经济发展可能“向右转”趋势,就是不同发展模式在危机中相互借鉴的重要事例。

与此同时,加强国家管理能力建设和体制调整,将会是今后席卷全球的重要趋势。国家层次上的“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模式的调整和发展,增强各个独立的主权经济体应对金融危机诱发的各种挑战的能力与空间,事实上是同金融救市以及经济刺激计划同等重要的国际问题。金融危机是全球问题,应对金融危机需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体制以

及更合理地发展贸易与金融领域内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但就眼前来说,解决金融危机的关键并非如何加大全球金融治理的力度,而是如何在国家层次上强化国内治理(national governance)以及加强各国政策协调与合作。目前,美国在变,日本在变,欧洲在变,中国也在变。中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处于一个高发期。

在这一基础上,世界应该理性和及时地思考人类的发展模式,调整以往西方意识形态主导的、以民主原教旨主义(democracy fundamentalism)为取向的单一发展观。西方成熟的民主政体和社会经济结构显示了在抗击金融海啸冲击时制度的稳定性和成熟度,但一味以西方模式为标杆、不顾自身传统和社会特点而盲目追求的民主化进程和高开放度,只能导致受各种难以约束的市场力量的左右,最终损害国家的实体经济能力和削弱人民的福利。东欧国家今天在金融风暴面前摇摇欲坠的经济状况,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今天全球金融危机下的世界生态,充分说明了“北京共识”的生命力——发展市场经济和谋求民生福祉存在多元化的选择和道路。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证明,福山教授所提出的“历史终结论”(end of the history)是不能成立的。不加约束的自由市场力量和民主的迷失,只会导致类似全球金融危机的“世界的终结”(end of the world)。○

全球金融危机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彭光谦 (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 少将)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正席卷全球。这场危机目前远未见底。这是 20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是深刻影响当代世界历史走向和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事件,也是深刻影响当代国际安全环境的重大因素。首先,金融海啸由资本主义心脏向全球蔓延,重创全球经济,引发全球经济衰退。这场危机不似经典资本主义危机从实体经济开始,而是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从次贷危机—信贷危机—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不似以往从

发展中国家开始,而是从资本主义心脏地带开始并向世界各地蔓延;从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和信心危机蔓延。这场危机不仅重创美国经济,使美国经济遭遇“经济珍珠港”,金融体系处于系统性崩溃之中,同时也严重损害世界各国经济。欧洲国家由于购买了美国大量次贷等“有毒”金融资产,拥有数以百亿计资产的金融机构纷纷陷入困境。英国大型房贷机构布拉福德—宾利被英国政府接管;比利时最大金融机构富通集团濒临倒闭;法国和比利时政府